

20 世纪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

散文卷



——黄霖◎主编——

SANWENJUAN

ERSHI SHIJI ZHONGGUO GUDAI WENXUE YANJIUSHI

宁俊红◎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20 世纪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
散文卷

——黄 霖 ◎ 主编——

SANWENJUAN

ERSHI SHIJI ZHONGGUO GUDAI WENXUE YANJIUSHI

宁俊红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 散文卷/黄霖主编; 宁俊红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6. 1

ISBN 7-80186-404-2

I. 2... II. ①黄... ②宁...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20世纪 ②古典散文-文学研究-中国-20世纪 IV. ①I206.2 ②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2480 号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散文卷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美术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00 千

印 张: 29.5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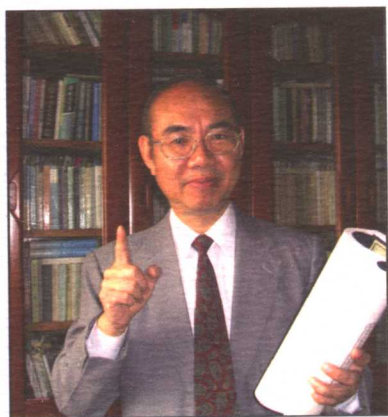
ISBN 7-80186-404-2

定 价: 4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策划编辑 / 梁 惠
☐ 责任编辑 / 刘丽星
☐ 装帧设计 / 王春杰



黄霖

1942年生，上海嘉定人。1967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现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副会长、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会长、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会长等。主要论著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合作）、《古小说论概观》、《金瓶梅考论》、《近代文学批评史》、《中国小说研究史》、《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主编）等。

总 前 言

黄 霖

约在十年前,我们开始酝酿着编写这样一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后来就将这一课题申报了“九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获得批准之后,就正式启动。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一课题,实为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形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学人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同时又是我们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进一步拓展的需要。

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承上启下,对传统来说是一种新变,对以后来说是一种过渡。当20世纪之初,文学研究步入现代化的进程之时,古代文学的研究虽然并没有被当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与文学领域中其他方向研究相比,显然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更何况古代文学的确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精神营养,故仍然受到人们的看重。从50年代至70年代,政治的介入,一方面使古代文学研究的有关课题异常红火,如一部《红楼梦》,就从50年代一直非同一般地红到了70年代;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研究现实课题的过于敏感,也有一批研究者往往将古代文学的研究当作相对安全的避风港,乐意在这里安身立命。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还算得上是一种显学。但到了20世纪末,政治似乎已与文学研究脱钩,市场经济却左右着上层建筑,实用主义思想泛滥,重物质,尚功利,人文学科本身就逐渐受到冷落。而在人文科学中,主流社会特别关注的又是当代生成的文化,对古代文学越来越显得冷漠,以致连中文系的大学生也越来越趋今远古,古代文学的研究开始尝到了被挤向边缘的苦涩。古代文学研究的路究竟该怎样走下去?现实需要我们作出回答。而反思历史,从走过的路中总结其成败得失,也可以为以后提供借鉴。

20世纪这一百年,是中国大变革、大动荡、大发展的一百年。在中国的学术发



展史上,也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关键性的一百年。我们处于世纪之交,就有责任及时地予以总结。或许,我们离研究的时代太近,甚至是由于置身其中,对有些问题未必能看得分明,对有些问题很难下结论,但我们希望我们的成果既能传之久远,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同时希望能服务于当世,为眼下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或多或少地提供一些有益的意见。只要如刘勰所说的“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努力以“平理若衡”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话,还是可以较为接近事实和真理的。更何况我们与时代离得近,也有离得近的好处,在多数情况下,比之后人能看得更细致,有些切身的感受,就非后来者所清楚,能体会,故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其不可取代性。与此同时,我们复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同仁,也处在承前启后的阶段。前辈学者从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到王运熙、顾易生诸先生,从创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到完成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与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在有关资料的整理及史的纵向的梳理方面,已经取得了众所公认的成绩。下一步怎样走?我们在摸索横向的“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研究的同时,觉得将批评史向学术史方向靠拢,也不失为拓展原来研究路数的一种尝试,于是就顺理成章地选择了《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这一课题。

所谓“文学研究史”,与“文学批评史”有联系而并不相同。所谓“研究”,本指花工夫去推求、穷尽事理的意思。因此,文学研究从方法来讲,当包括考订、训诂、批评、欣赏等诸多方面;从目的而言,有探索思想的真谛、艺术的奥秘,乃至字句的原义、故事的来源、作者的面目、版本的真伪等不同的追求。因而所谓“文学研究史”就不仅仅关心研究者的文学性批评与理论上的概括,而且也关注文献学方面的成果和实证性研究。它比文学批评史当有更广泛的内容和更高度的概括,以探讨和总结各种形式和不同目的的“研究”实绩、经验教训和演变轨迹。在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将在 20 世纪中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成果加以通盘的梳理,并联系其整个社会文化背景、学术思潮、文学思想的起伏变迁来评价其成败得失,描述其演变大势,有时还提出若干个问题,以有利于读者的思考。

定了总的目标,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编写。一百年的时间,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其间文学研究的成果也如汗牛充栋,时间涉及到上古至清末,文体则关系到诗词文曲稗等各类,可以按时代为序一一写来,也可以按文体为别分而论列。我们则以文体为纲,分成七卷:诗歌卷、散文卷、词学卷、小说卷、戏曲卷、文论卷,再

加一本总论卷,共成七册。每一卷,以时为序,虚实并观,不作划一的分期。但就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总体而言,约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兼收并蓄,中西融合,研究路数多元化的时期。第二个阶段,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这时期,学术研究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并逐步庸俗化、教条化、专制化,直到将学术完全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第三个阶段是“文革”之后,拨乱反正,在马克思主义主导下,全方位地参照和吸取古今中外学术思想的合理内核,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态势。在这里,必须充分地看到不同文体研究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进展有快有慢,成果有多有少,涉及的范围有广有狭,探索的问题有深有浅;而我们研究的主体也并不出于一人,执笔诸君,才性不一,各扬其长而力避其短,以充分展示其学术个性,故全书不想用一种统一不变的模式来加以框定。总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博观在先,征实为基,有发展的观点,有问题的意识;既重史料,也重史论;既有选择地解剖作家作品的研究,更致力于梳理研究大势的轨迹;不作资料长编,以期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研究史。

与纂史的体例相比,重要的还是要有正确的史观和良好的心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还是我们运用的基本的观点与方法,也不排斥借鉴其他科学的理论武器。当我们立足于百年学术兴替流变的基本事实之上,进行具体细致的条分缕贯、梳理爬抉时,将尽力避免任何情绪化的浮躁和局限于一隅的褊狭,这样才能认清这一段自己也居于其间的历史,对它作出深刻的认识和恰当的定位,总结出百年学术史的经验教训,为新世纪的学术研究填石铺路。为此,结合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实际情况,我们觉得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研究的价值取向:个人的自适与社会的需要

古代文学的研究本来多为个人行为,但这种个人行为之所以产生并能进行,一般都与一定的社会现实、时代精神、文化风尚等密切相关,故在实际上是很难将研究的个人性与社会性截然分开的。但就学者明确追求的价值目标来看,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完全出于学者个人的兴趣爱好,借文学研究以自娱自适,或追求某种纯学术上的价值,达到学术上的某种自足;另一种学术研究是与社会之需要、时代之精神、文化之变革自觉地联系在一起,直接或间接地包含着某种社会群体的功利性。同样是学术研究,前者追求的是“传世”,后者注重的是

“觉世”；前者的研究是以“我”为中心，后者的目的是有益于现世。所以尽管两者有时难分难解，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言，前者即可称之为个人性研究，后者则可称之为社会性研究。

长期以来，社会性的研究基本上占有主导地位。这是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往往使文人学士肩负着一定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使学术研究与社会需要联系起来，并往往与政治直接相关。远的不说，从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来，学术研究的经世致用已成为一种思潮。如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就力主治学要“通经致用”、“明道救世”，强调“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1]历史进入到20世纪，整个世界风云变幻。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一百年总的来说是一个多灾多难、救亡图强的时代。特别是在民族存亡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学者能从故纸堆中抬起头来，以国家的、民族的群体利益为先，用先进的社会思想装备自己，追求社会的安定与进步，发挥学术研究的积极的社会价值，这是难能可贵的。世纪之初，梁启超面对风雨飘摇的时代与动荡不安的文坛，大力倡导“文学界革命”，引进新学术，改良旧文学，应该说功莫大焉。后如闻一多“要为我们颓丧的民族开一个起死回生的文化良方”的学术精神，使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时代的学者不能不肃然起敬。他的有关《诗经》、屈原等研究都渗透着时代精神。在《人民的诗人——屈原》中，他说：“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的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地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屈原的言、行，无一不是与人民相配合的，虽则也许是不自觉的。”^[2]他的这些结论，就既不失学术之真，又闪现着这位热爱祖国、关心人民的学者的奕奕神采，对当时“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人民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另外，如郑振铎先生的那篇著名的《谈金瓶梅词话》，研究了《金瓶梅》所表现的社会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进而他联系现实说：“《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从而他再进一步说：“像这样的堕落的古老的社会，实在不值得再生存下去了。难道便不会有一个时候的到来，用青年们的红血把那些最龌龊的陈年的积垢，洗涤得干干净净？”应该说，郑振铎对明

代社会和《金瓶梅》，对 30 年代中国的社会所下的结论都是正确的，他的学术研究是科学的，但同时洋溢着一种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精神。因此，不难理解像《谈金瓶梅词话》这样的论文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上是具有经典性意义的。

解放后，大陆的古代文学研究者服务于社会的政治热情有增无减，大多数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调整了思想观点，将学术研究纳入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去。这对于一个新生的时代来说，需要统一思想来巩固政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后来，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被教条化、庸俗化。有些研究者在做法上本身就背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背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走向了专制化、僵死化，终于将古代文学的研究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一起简单地沦为不良政治斗争的工具，给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学术的不幸，更是时代的不幸。

现在，我们在反思和总结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时，正是在“文革”之后的这个历史背景上进行的，于是在当前的 20 世纪学术史研究中，很容易从过去的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涌动起一种彻底否定社会性研究而无限张扬个人性研究的思潮。50~60 年代被批判、否定和埋没的学者纷纷被看好起来，甚至被抬作“大家”、“宗师”而视作文学研究的正宗或主流。应该说，在过去被否定或批判的一些学者中，的确有一些好的学者，有一些好的成果，过去对他们作简单、粗暴的否定是不恰当的。但反过来，现在将一些经世致用、关爱人生的社会性研究的成果一笔勾销，恐怕也是不妥当的。要经世致用与关爱人生，有时候难免要与政治相关。事实上，即使文学研究与政治结缘，也不能简单地一笔勾销。关键是要看与什么样的政治结缘，怎么样结缘？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论及梁氏学术研究的政治性时说：“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3]至于像“文革”中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为政治服务”惟一化、绝对化，而这个政治在总体上又是逆时代进步的潮流，反人民大众的意旨的。今天，我们不能反过来也绝对化地排斥文学与政治的结缘，一切都要作具体的分析。说到底，对于那种与社会、与人生、与进步息息相通的古代文学研究不该作简单的否定。

再看以个人自适自足的个人性研究。明代广东布衣翟从先曾很有感慨地说，“今人之讲学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4]。清代一些学者在“避席

畏闻文字狱”之后,较多地倾心于个人性的研究。20世纪初,与梁启超走着不同道路的王国维,就强调“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5],追求学术的独立品格。就是对政治比较热心的章太炎,也主张“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6]。他们潜心学术,不计势利,辛勤耕耘,成绩斐然。对于这类纯学术的研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有用与否作为价值标准来加以衡量。哪怕他的研究与现实社会相去太远,哪怕他研究的内容过于琐碎,只要他能真正解决问题,就应该予以肯定,不应该用一句“毫无价值”而彻底否定。因为有的研究的价值不是直接显示而是间接产生的,不是立时见效而是慢慢显现的。但是,世界上真正不计功利,与世无关而作纯粹个人性研究的毕竟很少。现在不少人用以举证王国维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在文学研究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难道就没有一点现世实用的目的?现在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还有陈寅恪在学术研究上保持“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精神”,但陈寅恪说这句话是否就是从纯学术出发?诸如《柳如是别传》之类的著作,是否就是一种纯个人性的学术著作?是否没有寄寓一点对于现实、对于政治的“深意”?这是值得大家研究的一个问题。

应该说,个人性研究与社会性研究是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不能绝对地作肯定或否定。不过,当我们在考察20世纪的文学研究史上的这个问题时,不能不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衡量。人生活在中社会中,学术研究毕竟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历史。20世纪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总体上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因此,我们在总结这一个世纪的学术研究时,究竟从什么样的角度,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个人性的研究与社会性的研究时,不能不采取慎重的态度,再不要像过去那样简单地肯定一种和否定一种。我们不要简单地否定个人性的研究,但也不能得出相反的极端的结论:学者离时代、社会、政治越远越好。当今我们在回顾20世纪文学研究史时,冷静地联系一个世纪以来的实际情况,将社会性研究的成败得失,放在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纵横构成的坐标上考察,才会对其价值和意义有个比较客观的评定,而不会因时代环境的差异,对其产生隔膜。21世纪的社会趋向稳定有序,学术环境也将更加宽松平和,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可以放弃它的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相反,前几代学者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伟大精神,应该在新世纪学者身上得到新的继承和发扬。



二、研究的基本理路：承续传统与面向开放

我国古代的文学研究，早已形成一套独特的理路与方法，姑且称之为传统型研究。大致说来，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实证性的研究，诸如注释、校勘、考据等等，另一类则是赏析性的论评，包括各种诗文品评及批点、杂论等等。对于实证性的研究将放在下面再说，因为与它相对应的主要是阐释性研究。这组矛盾在传统型研究与开放型研究中都存在。作为传统型文学研究的理论、观点与方法，则在走向开放的20世纪中经受了严重的冲击、解构与新变。所以，这里所说的传统型研究主要是指后一类。而20世纪是一个开放的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也随着西学东渐而开始运用西方的观念、理论、方法和话语。20世纪文学研究的转型，当然主要体现在这种开放型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它的生根与发展，在吸取中国民族文化的血液而有所本土化的过程中，促使了中国文学传统的研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古典走向现代。这两种不同方法、不同形态的研究，分别在本土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中，相互融合、彼此消长，构成了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

本来，中国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所用的基本理论、范畴、方法、形态与其研究对象是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语境中产生的，两者可谓是同质同根，所以这种研究与研究对象理所当然地容易契合。20世纪之初，像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研究，明显地还带着传统的神韵。即使是一些仿效欧美模式新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之类的著作，同样与传统有着血肉的联系。它们的一些观点、材料，乃至编写体例，往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类目录书与史书中的《文苑传》之类的著作中，能找到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比如，现存早期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尽管他是参考了日人笹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后编成的，但“有人说，他都是钞《四库提要》上的话”。^[7]再如最早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虽然开列了不少的西文参考书，但基本上也是掇拾陈说，顺文敷衍而成，《四库提要》的引文触处皆是。即使如曾毅、谢无量、胡怀琛、钱基博等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与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方孝岳等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用传统的一套理论和观点来评述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脉搏。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传统的理论和话语很快地在反封建、反传统的大背景中受到挤压，开放型的研究则越来越得势，且势不可挡。进化论、人性论、审美艺术论，一开始就给文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正

如郭绍虞先生所说的：“当时人的治学态度，大都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这对我治学就有很多帮助。”^[8]接着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并逐步确立了学术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同时，西方近现代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如精神分析、神话人类学、语言分析学等等纷纷引入中国，至 80 年代后，更是掀起了引进西方方法论的热潮。这种突破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开放型研究，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丰富了研究的思维，开创了一系列新的范式，推进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且的确在许多方面能更好地解释文学现象。但这些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与其研究对象毕竟并不是同质同源，这就往往难以达到一种盐溶于水的境界，而常常会产生削足适履、牵强附会，甚至是格格不入的情况。对于这种“异质释义”所产生的消极因素，研究界一开始就对它保持着警觉。后来如罗根泽、朱光潜、钱钟书等都指出过中西文学观念、文学类型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不能简单地加以类比和照搬。20 世纪来势汹汹的开放型研究还带来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是在用西方的话语来阐释中国古代的文学时，忽视了传统理论的重新构建与中外理论的融通汇合，像 20 世纪初期王国维《人间词话》、朱光潜《诗论》这样注意汇通中外理论的著作越来越少，致使传统的理论在实际上处于被排斥和消解的地位。直到走完了近一个世纪的路程后，人们猛然觉得在文学研究中已经失却了传统的话语，患上了“失语症”。当然，对这“失语症”的严重程度，各人的理解不完全相同。我们反过来也可以找到传统还在这里或那里顽强地存在着、延续着，甚至生长着的理由，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到 20 世纪末，评析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范式、理论体系、表述方式与阐述话语已经不是传统的了。这不能不说是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大变化。因此，应该说，反思和总结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时，这方面的工作是重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把握了 20 世纪的开放性研究，也就是把握了 20 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特点之所在。

三、研究的课题选择：“热点”与“冷门”

古代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宏观的研究，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就某一类问题、某一个时段、某一种文体、某一个流派、某一个作家或某一部作品来加以研究的。这就存在着一个选择的问题。在整个 20 世纪中，人们的眼光往往集中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一个个热点。一些大作家、大名著、某一朝代的代表性文体及一些普遍关注的问题等等，往往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在这里反复耕耘，搞得

又深又细,乃至又烦又滥。另一方面,一些小作家、小著作、某一朝代的小文体及一些细小的问题,往往不为人们所关注,或有个别学者提及了,也得不到一定的响应。这种研究格局,深为一些研究者所忧虑。

这种貌似失衡的现象,其实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一般说来,那些“大”的问题之所以能形成热点,除了个别的是由人为甚至政治的因素所形成,如“文革”中的评《红楼》与批《水浒》等外,绝大多数还是由热点本身内在的吸引力与号召力所决定的。所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它们或其精神含量深厚,或其审美价值极高,或已成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或是当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借鉴,人们多花点力气在这里钻研,也自有其必要性。经过历史的过滤,一些作家作品等之所以不为世重,一般确实也无太大的价值,我们大可不必故意去钻冷门,甚至去“粪里淘渣”。一切当以研究对象的价值为转移。这个“价值”,有它本来自身的价值,也有它在当代意义上的价值。研究者的责任,就在于发现它的价值,阐扬它的价值。当然,随着社会思潮的转移,人们的价值观也会转移。比如官体诗,素来不为批评界所重,近来在重视文学形式的研究中则吸引了不少论者的兴趣;清诗大家王士禛,曾被目为“正宗”,然在50~60年代被当作形式主义的诗人受到冷落,到了80年代后,又被研究者们所关注。再如80~90年代形成研究热点的《金瓶梅》、金圣叹、王国维等,都曾经被搁置了相当长的阶段,备受冷漠与歧视。所以,“大”与“小”、“冷”与“热”往往是会转化的。我们对于一时的研究热门,在防止发烧的同时,也不必紧急刹车,悬置不论;对于一时不为世重或者冷门的问题,在重视挖掘的同时,也要防止矫枉过正,说过头话。选择研究对象,当从我们研究的目的出发,视其本身的价值来决定,既不盲目追逐其“热”,也不刻意挖掘其“冷”;研究“热门”的文章再多,有新认识、新材料、新方法,该写时还得写;有些“冷门”实无价值,也大可不必去死钻,去猎奇,乃至硬把糟粕吹成精华。

这样,是否会形成研究的失衡,使一部文学史成为“跷脚”,既不能正确评价名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又遮蔽了许多活生生的文学现象?这就关系到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取向的问题。研究古代文学的目的,主要还是:一搞清本来面貌,二为现世所用;而前者归根到底也是为后者服务。热点之所以成为热点,就因为它的某一方面在现实中引起人们的兴趣或共鸣。研究“冷门”,无非是随着世风的转换,眼光的变化或者研究者的特别识力,能从中发现出重要的意义,如

陈寅恪论《再生缘》与柳如是等；或者它本身并无特大的审美价值与现代意义，但它作为在文学史发展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也有把它弄清的必要。但一般说来，它们将永远难以取代经过历史冲洗过的名篇。在一部文学史上和文学的研究史上，将永远有热点与冷门，将永远不会有“平等”。

四、研究的理论指导：“阶级论”与“人性论”

20 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本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与方法，但值得注意的是阶级论与人性论。

从 20~30 年代起，特别是 1949 年以后，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主要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文革”结束，特别是 80 年代以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似乎被一些人视作极左的理论而彻底抛弃，代之而起的是人性论的高扬。某些时段、某些文体的文学研究，在某些人那里几乎就成了人性论的图解。“人性论”之所以高扬，这是由于长期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人的欲望、人的个性受到压抑的反弹，也是中国传统的、特别是“五四”时期强调人本思想的继续。当然，马克思尚未摆脱唯心史观时写的诸如《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也肯定人类的本性与人道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表《共产党宣言》后，强调无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揭露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人权和人道主义的虚伪性和局限性时，也没有抛弃处理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人道主义原则和对人类本性的满足。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阶级论与人性论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与复杂的理论交叉。彻底否定人性论显然失之过左，文革后排除干扰，注意从文学与人性的联系中去考察文学的发展过程，这对冲垮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研究框框，迎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一次大解放、大转型，其积极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但是，人与人类的本性从来不是抽象的。从“满足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来看，诸如吃、喝、爱、学习、运动、文娱活动、艺术创造、思考、研究理论，以及享乐、显露生命力、情欲与人对自我的重视等等，其内涵都是无限丰富的。不过，人的生活和需要中最基本的是：一生存；二平等（包括物质和精神上的）；然后才谈得上享受和个性的自由等等。可惜的是，自古至今，人类在多数地方、多数时间内常常是处于一种有等级的、不平等的社会里，总是少数人可以自由地享受，而多数人处于不富裕、贫困，甚至在生存的边缘挣扎。这就有了“民本”思想，有了“均贫富”的口号，有了“阶级论”，有了无数的反映社会不平等和希望能平等地享受人生的文学作品。因

此,在人类尚未普遍平等的社会里,人的阶级性,或者说阶层性、等级性、差异性,正是人类最基本的本性之一。所以,我们的祖先早就把本来表示台阶的不同等级的“阶级”两字,形象地用来指代人类的“上下大小”、“高下有差”,^[9]表现社会的不平等。我们讲人性,就无法否认人的等级性、阶级性,无法回避人在生存与精神方面的最基本的不平等性。也正因此,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在强调人本思想的同时,就提出将文学分成“平民文学”、“贵族文学”两种,且号召打倒“贵族文学”。到1931年贺凯所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就以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来构建一部中国文学史。所以20世纪的前几十年之所以在古代文学研究中,“阶级论”能风行天下,也是有其历史渊源与社会基础的,并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灌输的直接结果,也不是后来政治上的强迫所致,研究者接受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以此来研究文学也并非都是白痴、愚民,或说违心话。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人的社会关系并不都是阶级关系,人性并不都是阶级性,人与人之间更不是时时刻刻处于残酷的阶级斗争之中,不同阶级的人在生活、思想、感情上都有可能相互交流与融合,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也自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因而在考量社会中的人及与人相关的文学等等时,也不能一股脑儿地都用阶级论来硬套。“文革”及“文革”前十七年研究古代文学的一个重大失误,主要不在于运用了阶级论,而是在于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绝对化、僵死化;不是从作家作品的实际出发来分析其思想与感情,而往往是用一套教条的阶级论来硬套一切作家作品,于是产生了万喙一词的可悲局面,在根本上消解了真正的文学研究。因此,我们必须将运用阶级论与运用阶级论的失误差分开来,重新正视与正确对待阶级论。

我们再面对现实。人们在抛弃“阶级论”而高扬“人性论”的道路上走了这一阵子后,一些人越来越将“人性”狭隘化,往往只是谈享乐,谈个性,甚至只谈男女情欲,而把社会的秩序、人类的关怀统统置于脑后。古典文学的研究并不是空中楼阁,它的研究思想往往来自现实,又反过来对现实产生影响。比如像晚明那样一个张扬人性而放荡的时代,本来就有许多令人深思之处,值得不值得心向往之?而当今的青年中,有相当一些人,理想缺失、前途迷茫,或者见钱眼开、逐色疯狂。这样的现象该不该像反思晚明时代一样值得我们深思?现实的另一面是,人们毕竟并

不生活在一个水平线上。相当一部分的人恐怕还谈不上享乐,谈不上个性满足,他们体会最深的恐怕不是共同的人性,而是人性中的不平等与等级感。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古代文学研究,就有责任与义务以人为本,面对现实,去促进当前社会的安定、生活的和谐,鼓励人类去追求正义、憧憬理想、建设文明,以及相互间的爱!将对古代文学的解读与阐释同现实的精神相沟通,与建设和谐的社会相对接。

因此,当“阶级论”被抛弃了一阵子之后,面对现实,静言思之,我希望研究界能正视“阶级论”,不要再将它与“人性论”对立起来,视作洪水猛兽,而是将它们统一起来,要从阶级论中看人性,又以人性论来看阶级。我们有必要将阶级性、阶层性、等级性等作为“人性”中的一种表现,去研究、解读古代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人遭到了另一类人的压迫、践踏后的感情、呼喊和追求。这样,“阶级论”经过了一番“否定”之后,重新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或许能使我们对于“人性论”的理解更为全面,古代文学研究的道路更为坚实。当然,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武器不仅仅是阶级论或人性论,哲学、美学、史学、伦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等,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运用,古代文学研究的道路是无限宽广的,这里只是就 20 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谈一点看法而已。

最后,不妨再由人性中的等级性而带及人性中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的问题。“人性”本来就不仅仅是追求个体的满足,还有一种“群”的本性。人作为一种社会的动物,个体的生存与满足,是与群体的存在与发展密切相关的。“人的一切需要”,也就必然包含着诸如祈求民族的兴旺、国家的富强等感情。因而,诸如爱民、爱国,追求社会的安定、世界的和平等,与追求食与色、个性与享受一样,都是人类的本性。可惜的是,20 世纪以来,在西方的完全的个人主义的强烈影响下,相当一部分人把个人理想自由的完全实现作为人类的未来目标,将中国古代学人理想中“成己”的同时“成人”,“小我”与“大我”的利益相统一的精神背弃殆尽,以先验而狭隘的人性精神来编织古代文学,其结论是令人堪忧的。当然,人的“群”的本性与个性有时会发生矛盾与冲突,但有时也能相互调和或统一。我们在用“人性论”来观照古代文学时,就不能偏于一方,既要看到古代文学中张扬个性和人欲的一面,也要看到为维护社会群体利益而对那种追求极端的个体欲望所进行的反拨与批判;既要看到人性中的私人性,又要看到人性中的群体性,胸中要有全局,尺度必须把握,这样才能实事求是地去解释历史。